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

——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袁洪权¹，袁高远²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知识分子革命”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关键词】革命文学；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悲壮性；“决裂”场景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1-0031-07

革命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题材，在文学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革命是它要表达的最重要主题。只有对革命主题描写得使人感动，它才能激发民众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文学观念在进入革命文学创作时就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以至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无法舍弃对革命的忠诚描写。从 1928 年革命文学兴起开始，直到建国后革命历史小说书写，这种忠诚的姿态都没有改变。但怎么显示忠诚，这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思考的一严峻问题。有可能你创作出来的作品被读者误解，并直接导致作品被否定，因为忠诚是要通过一定文学场景的建构，需要用事实来进行说明的，不是作家一厢情愿就可以达到写作的预期目的。那么，忠诚这一革命者的性格在革命家看来，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呢？原来，忠诚需要被“确认”。此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革命文学发展史让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线索：在革命文学表达与书写中，“决裂”场景建构是每部作品无法逃避的，它是革命者经受考验后最

终被确认为革命身份的一次最有效的检测方式。革命不是儿戏，知识分子天生有缺陷，他/她必然有一被考验过程。只有在考验过程中被革命家或革命政党确认为革命者后，他/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这考察期间，他/她只是“准革命者”，有革命潜质，至于怎么发展，那不是主人公可以确认的。本文立足于 1928~1958 年中国文学发展史考察，试图对“决裂”场景建构过程做本质探讨，还原历史细节：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的历史复杂性。

一、“决裂”场景在 1930~1950 年代文学历程中的建构

本文把研究视点放在历史考察中。总体来看，从革命文学创作开始到文革文学时期，此创作大致经历四种模式，以四个文本为代表：20 年代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①，30 年代丁玲《田家冲》^②，40 年代丁玲《在医院中》^③，50 年代杨沫《青春之歌》^④为评价中介：

收稿日期 2006-8-22

※本文是西昌学院资助课题“左翼文艺运动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的‘冲击’”的部分成果，课题编号为：XB0507。

作者简介：袁洪权(1978-)，男，土家族，重庆市人，硕士，讲师，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学研究。

袁高远(1958-)，男，回族，四川西昌人，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1. 告别亲情、告别爱情与走向革命：20 年代“决裂”方式

蒋光慈是革命文学中一重要作家，革命文学初创期，他不懈的创作使革命文学站立住了脚跟，建国后文学史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蒋光慈是最早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数量也很多，影响也比较大。……这些作品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在鼓动群众斗争情绪方面，在首先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方面，都是著有一定的成绩的”^{[11] (P259-262)}。要研究革命文学发展史，蒋光慈必须考察，其创作为后来奠定了规范。关于知识分子“决裂”到走向革命，是从他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咆哮了的土地》在 20 年代末有重要代表意义。

作为知识分子，李杰何素月的成长，因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成长道路的艰难：他们不能像张进德的成长那么顺利。李杰是大地主李敬斋唯一的儿子；何素月是大地主何松斋的侄女。这一出身的血缘关系使他们参加革命受到革命群众质疑，如李木匠就是一种典型观点：“我看干，我们总是要干的，没有什么多说头。不过李大少爷是不是能和我们干到底，这倒要问问李大少爷一声。如果半截腰里不干了，那我们不是糟糕吗？”⁽²⁴⁹⁾。

李杰无法承受来自革命群众的猜忌怀疑。为了证明他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告别他可耻的阶级出身，在李木匠的刺激下，他同意火烧李家老楼。但在这一悲壮“决裂”场景中，我们看到作家写作时并没排除李杰的感情，他感到“痛苦”（这种感情后来受到批判，认为表现了知识分子情感）：

李杰：他（指李木匠）主张将土豪劣绅们的房屋都烧掉，破坏他们的窝巢，这是对的。……但是李家老楼烧不烧呢，木匠叔叔问我。你知道，木匠叔叔素来不相信我，如果我不准他烧李家老楼，那不是更要令他不相信我了吗？而且那时候恐怕这一乡间的农民都要不相信我了。别人的房子可以烧，可是你自己的房子就不能烧，哼！……他们一定不满意我。如果他们不满意我，那我还干什么革命呢？这一次对于我是最重大的考验，我不能因为情感的原故，就……唉！进德同志！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你知道我这时是怎样地难过啊。我爱我的天真活泼的小妹妹……⁽³⁸¹⁾

李杰：让他们去烧罢！我是很痛苦的，我究竟是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忍受……只要于我们的事

业有益，一切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³⁸¹⁾

李杰为了革命，舍弃大少爷的生活习惯（小说中描写他第一次和张进德吃饭的心理）、舍弃爱情（与何素月朦胧的爱情）到最终与阶级血缘彻底“决裂”（用革命大火活活烧死病重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一次次“决裂”让人撕心裂肺，主人公的痛苦可以预见。他在经历一次次的痛苦后，得到诸如李木匠、王荣发、吴长兴等人确认。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身份只有民众能确认。但这一确认过程是漫长的，是每个革命者必然的成长道路。李杰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群众确认后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但在李杰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如果缺少火烧李家老楼这一悲壮场景，是没办法真正确立起李杰是否是革命者身份。具体而言，火烧李家老楼给予李杰身心的痛苦是巨大的，决策之后李杰昏死过去。他无法承受身心的压力，毕竟那是自己的亲人（母亲和妹妹），小说对这一细节进行了传神描述：“李杰的脸孔即时苍白起来了。他明白了李木匠的意思。”⁽³⁷⁸⁾“李杰在绝望的悲痛的心情之下，两手紧紧地抱头，直挺地向床上倒下了。他已一半失去了知觉……”⁽³⁸⁰⁾这种灭绝人性的“决裂”，使人内心不好受。为了革命不至于必须牺牲这么多的东西。李杰的革命成长是牺牲了自己的亲情、爱情为基础的。

何素月作为有统治阶级血统的女性，其成长必须经历人生考验。当得知叔父将对农会进行破坏的消息，她内心里出现了复杂的感情波澜，心理意识中进行过矛盾的斗争：一边是革命群众；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叔父。为了革命群众必须牺牲养育自己的叔父。何素月参加革命“决裂”的第一步是告别亲情，与她的养育叔父告别，为确立自己的身份寻找机会。接下来第二步是寻找革命精神导师，李杰不能做她的精神导师，就像李杰不能做张进德的精神导师一样。与张进德相遇，并由张进德英雄救“美”，使何素月在精神上找到了她真正的依靠。何素月不能和李杰结合，这是由他们的血缘关系决定，他们两人在血缘上的不纯洁性，必须要求他们与另一个阶级结合（无产阶级），才能使自己体内的血液得到重新整合，以便使自己新生，李杰只能和毛姑结合（这结合没完成），何素月只能和张进德结合。她成长的第三步是革命战场上的考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她受伤，但她并没由此倒下或者对革命消沉，而是执着追求革命，这种坚定的革命意

志,最终被张进德确认:“张进德并没答言,走上前去,用着两只有力的臂腕将她的微小的身躯抱起来了。何素月也不反抗,两手圈起张进德的颈项。两眼闭着,她在张进德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梦……”(421)何素月最终成为革命者,但她牺牲了自己的亲情、真正的爱情。

2、同甘共苦、深入基层与大胆实践:30年代“决裂”方式

作为左翼文艺中杰出的女作家,丁玲本身就是一传奇神话。她30年代的小说写作,从《水》开始实现了文学“转向”,被认为是左翼文学“新小说的诞生”^[2]。知识分子革命者与旧家庭决裂的小说是《田家冲》。

小说主人公是三小姐。三小姐的革命追求引发老爷不满,老爷决定把她送到乡下封闭起来。她要到乡下的消息传到田家冲,给赵得胜一家造成不小的冲击。赵得胜感到惶恐:她不是七八年前的三小姐,他家不知怎么招待这一贵族家的小姐。么妹的姐姐与三小姐幼小是好朋友,这时她觉得三小姐下乡来肯定不认识她,内心里,她觉得三小姐是贵族家庭出身,阶级差别只会越来越大:“恐怕她不认得我们了”。(264)三小姐到来与他们的预期产生差异:“这不是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她穿着男人的衣裳!”(270)这传达出三小姐与众不同,明显带着革命色彩进入人们视线。三小姐并没显示她高贵的出身,相反她极力融进么妹一家的生活里。大家逐渐接受她融进生活中:“大家不受一点拘束,都忘记了她的小姐的身份,真象是熟朋友呢。”(271)脱离封建家庭的三小姐到田家冲感觉到一种内心自由,她觉得么妹“真是幸福”

(272),为么妹有那样一个父亲感到骄傲:“你有一个这未好的爹!你有一个这未好的爹!”

(273)么妹的大哥赵金龙与她有朦胧的爱情,但出身、血缘的差异使他们的身份产生差距,大哥对三小姐的到来感到高兴,但内心忧心忡忡。高升是穿插小说的一次要人物,从这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三小姐对他的鄙弃:“老赵!你放心!我懂得的!高升这东西就不是一个好人,你不要听他的。”

(276)这给人一种感觉:三小姐不象那些高贵家庭小姐,她很朴实。另一细节是吃饭。三小姐吃饭时没看见赵得胜父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父子就坐在灶门前早餐”,原因是“他们都脏不过,怕小姐不喜欢,所以不进来,而且以后都不要他们进来

吃饭,她们说那两兄弟都粗野得怕人,不懂理的”。(275)她对赵得胜一家的举动感到生气:

“她不准他们再在厨房吃饭”(276)。这彻底打破了她与赵得胜一家的阶级界线,形同一家人。她不仅与他们一家生活得很融洽,而且“常常帮着他们做事,譬如打谷,填鞋底,她都做得出来”(276)。这些表明:身份被抹平,消失了她的贵族身份,使她身份上容易被下层群众接受。这是她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她迈出第一步后,积极投身农村,深入基层参加实际革命。首先她倾听赵得胜一家诉说生活的艰辛:“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听他们的家常,听他们一生的劳苦,听他们可怜的享乐。这人不但听了,还要答应他,还要追问下去,还要替他们解释,解释这劳苦而得不到酬报的原由,而且她给他们的理想和希望,这可能的实现。她教导了他们,她鼓舞了他们。”(277)并说出一些过激话:

“你们不能老靠着我家,这是靠不住的,你们应该觉悟,你们应该想法,其实你们还吃了亏呢。”

(282)她俨然以革命启蒙者身份出现,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者。她启发赵得胜一家反抗。但她不满足于赵得胜一家清醒,她需要更多年轻人意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她走出赵家,到广泛的民众中去。为了显示她革命的坚定性,她与家庭“决裂”:把她的家比作“虎狼之家”。她把那个“家”犯下的罪恶告诉么妹,使么妹懂得一些浅显的道理。她的革命行动需要人对她进行确认,否则这些不会被看作革命行动。这时大哥出现了:“我相信你是对的。我不说话,可是你得留心。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坏人,你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容易认识你。”

(291)

三小姐走向革命成为一革命者,经历过程虽然没何素月那么壮烈,但也有独特之处:那就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必须把知识分子架子放下,先取得民众对她革命身份的认可,再积极投身实际革命过程中进行大胆革命实践。

3、“女”性特征消失与革命成长确认:40年代“决裂”方式

40年代《在医院中》的“决裂”场景有意思。这是丁玲进入延安后在双重身份下写作的小说,使其话语呈现出复杂含义。主人公陆萍,小说对她的上海生活有说明。这虽是一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对理解主人公的革命成长道路却有深刻意

义。她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战事的医疗服务。在那里，陆萍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受伤的战士，而那些受伤的战士也把她当作“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在陆萍自己，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母亲”“情人”，在别人的眼里，她也被当作一个“母亲”“情人”。至少这传达出陆萍身上拥有的母性和妻性。到达延安后，陆萍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什么？她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别人”在文本中有几个相关的人。院长虽然没有直接看陆萍，但她的介绍信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一种隐喻或象征，院长是这样看她的介绍信的：“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把陆萍的身份象征当作买草料的收据，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陆萍那个尊严的不受重视，她的女性身份已经消失得没有踪影^[3]。

陆萍的着装也说明了问题，她本来身段很轻巧，但她穿的是“男子的衣服”。她的这种着装并没引起院长的好感，“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接见陆萍”。为什么一个“身段很轻巧”的 20 岁年青女子，偏偏要身着“男子的衣服”？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表述了这行为的深层原因：“延安人似乎还迷信着爱美与工作的不相容的。”^[4] (P169) 原来特定的时代里，延安人崇拜男性，“像女人”反而是女人的一种耻辱标记，女性们更多的是追求男性化：着男人衣服，模仿男人性格。陆萍就是这样的化身：“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病症的仪式化治疗过程中，断腿人把陆萍称呼为“同志”。“同志”这一词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对男人和女人在特定的时代里都称呼为“同志”，以便使男女实现平等；“同志”也象征着阵营的划分，只有属于同一阵营的、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够称为“同志”。但此词易造成多义，本文中就是如此，陆萍被组织接纳的原因是因为组织认为她被改造好了，所以很亲切地称呼她为“同志”，表达出革命阵营内部的某种思想的统一。但当男人和女人都被冠名为“同志”时，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特征在无形中被消解，这与陆萍衣着的内涵有同样效果，称她为“同志”意味着她属于同一阶级阵营，也预示她正被“男性化”。

陆萍从一具有母性和妻性的人变成一阶级的人

(失去了母性和妻性)，放弃母性和妻性跟她患病到最终被治疗有着同等效用，她失去的是“原先”的陆萍，得到的是被党接纳的新“陆萍”，这是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从家庭获得解放，在群众中又失却了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个性，是幸福还是痛苦？这只能等待他们自己回答”^[4] (P169)。这从侧面反映出延安边区一些真实问题。虽然是一细节过程，但它的政治蕴涵相当深，丁玲作为启蒙者身份自然流露出来。她为女人失去母性和妻性的危险感到内心不安。这是她不久后写作《三八节有感》的一股内在冲动力量。

4、冲破重重关卡的成长道路：50 年代“决裂”方式

建国后革命者成长史小说，主要体现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在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用文学史家的话说：“《青春之歌》既是‘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5] (P118) 它先以小说文本后以电影的形式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起过模范的作用，她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伴随政权更迭，“胜利者”登上历史舞台，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陈思和对这一“胜利者”身份登台表演说过语重心长的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胜利者愿意自己的成功成为某种历史性转折的标记，愿意看到历史在自己的成功处出现一个句号。某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它把个体的悲剧性价值从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分离出来，它让个体生命的悲剧如一道水流淹过了固定的历史句号，从而违背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文化基调。”^[6] (P22) 知识分子问题的描写，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写作中一棘手问题。这关系到写作代表什么意图。我们知道，建国后文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它对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戒备心理——不相信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7] (P851) 周扬建国后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不仅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权威阐释，而且对知识分子写作提出严厉限制：知识分子在文本中只以“改造者”身份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写知识分子成长史，杨沫不能逃离此规定。林道静成长必须严格遵循此规

定:她必然需要改造。没有改造过程,没有改造的残酷性,林道静不能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因为林道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身上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思想,真正的革命者只能是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她的指导思想。她的改造过程不可避免,没有改造过程描写,不足以表现出林道静的革命成长过程。林道静的成长,意味着必须穿越层层关卡。主人公的出场意味着她在劫难逃:“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3]用研究者的话说,这一描写传达出重要的信息,浑身上下全是白色意味着“我们的主人公此时处于一种纯洁的、混沌未开的、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之中”^[8](⁹⁹⁰)。林道静的出身决定了她与身俱来的“肮脏性”与“可改造性”相互依存:“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的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243]“肮脏性”需要彻底除去,“可改造性”意味着她可被接纳。林道静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这对林道静相当重要。小说交代了林道静的出身,母亲秀妮是一村姑,21岁那年被林伯唐强迫结合。这就是林道静所说的“地主的女儿”和“佃农的女儿”的双重身份。母亲在她一岁时死去,她是被林家逼死的。这道出林道静和林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她与林家只能走向“决裂”,母仇子报天经地义。徐凤英把林道静当作摇钱树,想把她作为赚钱工具嫁给胡局长,这让林道静看出了她在家中的处境,决心与家庭彻底“决裂”。这是她走出家庭的关键一步,预示林道静走向新生的可能。余永泽英雄救美式地把林道静从绝望境地拯救出来,但他用的是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林道静预期的成长产生差距。定县生活中两个男性进入林道静的生活视野:一个是坚强的革命者,卢嘉川;一个是追求自我狭小天地生活的个人主义者,余永泽。刚从家庭走出,林道静的思想没那么快的发展,她必须经历一中间环节——迷茫于个人主义思想中,定县的选择说明了这点。生活现实的再认识,使林道静终于意识到:“生活象死水一样。除了吵嘴,就是把书一本又一本……卢兄,你说我该怎么办好呢?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192)余永泽逐渐淡出林道静的生活视线,革命成为她生活中思考的中心问题。但是她

的革命需要人确认。卢嘉川不能确认,他要以革命的牺牲精神陪伴林道静成长。林道静须在“血”的教训中领悟革命。

成为一个革命者,最终目标确认方式是党员称号。林道静需要党员称号,她渴望革命。在具体革命活动中,她被捕了。这给她一次严峻考验机会,她遇见了真正的女革命者林红。林红的成长是千辛万苦的过程,她曾经牺牲自己的亲情,才被革命者确认革命身份。林道静在受刑后被林红确认为革命者身份。而这一受刑过程,显得相当残酷,小说对这一场景作了描写:

闭着眼睛,道静依然站在地上,不声不响地好象睡着了。她能够说什么呢?她咬着嘴唇,只剩下一个意念:

“挺住,咬牙挺住!共产党员都是这样的!”……

就这么着:她挺着,挺着。杠子,一壶、两壶的辣椒水……她的嘴唇都咬得出血了,昏过去又醒过来了,但她仍然不声不响。最后一条红红的火箸真的向她的大腿吱的一下烫来时,她才大叫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413)

林道静经受了敌人折磨,身体上留下了证明她清白身份的印记,用研究者的话说:“这次身体的‘铭写’证明了她对党无限忠诚的可能。”^[9](¹⁰⁰)林道静身体折磨后接受了更加庄严的任务,她要把林红给她的任务转交给党组织。她需要得到党组织的身份确认。“这一天终于来到了”(474),组织看了林道静的自传,审查了她的全部历史,正式批准她入党。她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她看来:“从今天起,我将把我整个的生命无条件地交给党,交给世界上最伟大崇高的事业……”(476)只有被党确认革命身份后,林道静才真正投入到革命阵营中从事革命工作。

林道静终于成长为一坚强革命者,后来领导了一二·九示威游行,成为革命领导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成长道路的真实写照。她与过去生活、过去思想彻底“决裂”。

二、“决裂”的实质与意义

选择蒋光慈、丁玲、杨沫小说作为评价中介,有深刻意义在内。三位作者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

革命过程，文本中人物的塑造或多或少有作家的影子，这为阐释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史提供了方便。李杰、何素月、三小姐、陆萍、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以简单概括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艰辛史，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史。

革命是庄严而神圣的事业，它不容许人（主要是坏人或假革命者）对它进行玷污。这要求参加革命的人在身体上和思想上的圣洁，身体和思想的圣洁标志着革命的圣洁与神圣。革命阵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它的队伍必须保持纯洁性。知识分子革命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圣洁化过程，不管是身体上或者精神思想上。由于政治家历来看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有毛病。知识分子的不洁身份注定他们参加革命的艰巨性和残酷性，因为知识分子要么先天有剥削阶级血统，要么后天有“小资”情调，这对革命阵营的纯洁性是一强烈而严重的挑战。

李杰和何素月追求进步需要参加革命，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教育。但他们参加革命首先遇到困难：血统上存在问题。这对革命阵营是一潜在伤害。革命群众对李杰、何素月投下了不信任的目光：大少爷和小姐也要革命？真是笑话。他们要参加革命可以，但正像《青春之歌》中江华对林道静说的：“你要经得起考验，党是会给你打开大门的。”（277）李杰在成长过程中与革命群众同吃、同住、同睡，逐渐建立起革命群众对他的信任。真正信任的考验是火烧李家老楼。他获得李木匠的身份确认，最终成为革命者，并且成为革命领导。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必须有一考验期，能够通过考验期，他可以成为合格的革命者。当然在这考验期没通过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革命者就显得渺茫了。三小姐是老爷想把她封锁起来，以为送到农村她就没革命兴致，但三小姐却在农村展开革命宣传教育，并进行真正的革命实践，使田家冲显示出革命征兆。三小姐如果不与家庭“决裂”，她不可能走到民众生活中间，革命也成为空谈。但三小姐要成长为革命者，她的革命身份是在赵得胜一家的确认后才能真正开展起来的。陆萍的成长道路显得更复杂，她的成长牺牲了她的性别特征——母性和妻性在她身上消失。她与过去具有母性和妻性的陆萍告别了：她成为“同志”。林道静身份的确认是她彻底告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

并在敌人对她的身体进行阅读后才正式被接纳为革命者。知识分子成为革命者的成长道路的确显得很辛酸，比起张进德等人的革命道路与成长，真是天壤之别。张进德们革命顺理成章，不需质疑，不能质疑。他们天生就是革命者。李杰的“决裂”显得非常悲壮，具有悲剧美学效果，知识分子经过死一样的考验后，民众终于理解了他政治革命的意图（真是革命），当他知道他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时，他确实昏死过去过。何素月决裂了亲情和真正的爱情，走向革命。三小姐虽没有昏死过，但她的革命者身份是在误解与理解之间徘徊，她与家庭走向对立是一种“决裂”，最终才被确认为革命者并且是领导者身份。陆萍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被革命阵营接纳，那她只能消失她的女性特征和女性的日常表现，越来越男性化。林道静先天的血统决定了她成长的不平凡，何况杨沫在对林道静的塑造过程完全以党史的要求来写作，本身就是一庄严的历史使命，塑造的人物需要传达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林道静这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领导人，她必然有传奇故事，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这既证明革命的艰巨性，又证明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决裂”是每个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然选择，不管是李杰还是何素月，不管是三小姐还是陆萍，也不管是林道静还是其他人，只要他/她是知识分子身份。

只有“决裂”场景的描述，才能真正传达出知识分子从原先的血统或者原先的小资情调中走出来，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要流血。革命要洗脑，脱胎换骨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从四个文本我们可看出：20年代、30年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不需要革命者引导，他们自己可以走向革命阵营；但是延安文学及新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成为革命者的艰难程度明显地比20年代和30年代大，他们要成长为革命者，必须有真正的革命者引导，陆萍是在害疟疾的老党员引导下在庄严的治疗仪式中走向革命成为革命者，林道静则是在几个革命者（陆嘉川、江华、林红）的引导下走向革命成为革命者。

“决裂”在小说中只是一场景建构，本身属于细节，但正是这细节描写表现出知识分子作家写作的历史：知识分子从对自己的优越性地位感受逐渐沦为知识分子必须经历改造的过程，他/她必须有先导者对他/她进行引导，才能走向胜利的彼岸。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蒋光慈 《咆哮了的土地》, 《蒋光慈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
 ②丁玲 《田家冲》, 《丁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版。
 ③丁玲 《在医院中时》, 《丁玲短篇小说选》同②。
 ④杨沫 《青春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 月版。
 [1]丁易.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5.
 [2]冯雪峰. 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J]. 北斗, 1932, 2, (1).
 [3]常彬. 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 文学评论, 2005, (5).
 [4]赵超构. 延安一月[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5]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陈思和. 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A]. 鸡鸣风雨[C].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7]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毛泽东选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李扬. 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9]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Rapture”: Solemn and Stirring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Revolutionists' Growing to Maturit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Roared Land, The Village of Tian Jia Chong, In the Hospital, Song of Youth*

YUAN Hong-quan¹, YUAN Gao-yuan²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As the popular scheme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expressed the process tha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ists had been accepted 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which was the key to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text. Writing the course needs to pile situations on and in the situation piling on, it is indispensable to forming “rapture” situa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re text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ists ultimatly were accepted by the revolutionary camp, which certainly had a “rapture” course. “Rapture” implicated new birth and maturity of intellectual revolutionist. But the “rapture” course based itself on the sacrifice of friendship and relativenesship, also love. This manifests the solemn and stirring character of raptural situ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Roared Land, The Village of Tia Jia Chong, In the Hospital, the Song of Youth*, the passage tries to discribe the “rapture” situation from 1920s to 1950s: the sacrifice of intellectual revolutionist has his or her ultimately value tendency.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Revolutionist; Growing to Maturity; Solemn and Stirring Character; Raptural Situation.

(责任编辑: 张俊之)